

（二〇一八年二月六日出版）

---

本期目录

【春秋史笔】	毛的文革遗产与习近平治国模式（上）	高文谦
【抗拒遗忘】	唯一文革博物馆消失意味着什么？	蔡慎坤
【亲历者言】	我的文革	阎长贵·徐友渔
【往事非烟】	清华文革风浪四年（下）	阎淮
【亡灵祭坛】	赵老师	韩莹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春秋史笔】

毛的文革遗产与习近平治国模式（上）

• 高文谦 •

（作者按：这篇论文是为参加纪念文革发动五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而写，全文分四个部分：一、邓小平应对毛文革遗产复活负责；二、毛的文革遗产反文明反传统反人性；三、毛是红二代的精神教父；四、毛魅影下的习近平治国困局。）

一、邓小平应对毛文革遗产复活负责

毛泽东是中国人的宿命和孽债，生前曾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命运，改变了近代中国原有的历史走向，把整个国家推入一场共产主义乌托邦试验场。尽管他已经死去多年，但幽灵仍在缠绕着中国，牵制着未来中国社会的走向。而文革则是毛留给中国最大的政治遗产，一直蛰伏在朝野人心之中，时隐时现，挥之不去，左右着当今中共最高执政者的思维方式、执政模式、话语风格和路径选择。

毛泽东发动文革，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他政治生涯中一场最大的赌博，乃至一生的归宿。文革倾注了毛一生的心血，浓缩了他全部的政治理念，是他对中共建政后党内分歧、历史恩怨所做的一次总的清算。他自以为可以指点江山，再造历史，变共产党的党天下为毛氏的家天下，最后却被历史所捉弄，败于党内官僚集团。死后不到一个月，江青就被囚禁，精心安排的由文革派接班的布局灰飞烟灭。毛晚年背诵《枯树赋》的悲凉心境，正是对这种结局的预感。

毛的文革遗产与中共官方的意识形态是一对孪生兄弟，前者是后者的极端形式，后者是前者的常态表现，两者同源，互为依存，剪不断理还乱。官方意识形态一直就存在着“文革基因”，其核心是敌对思维和斗争哲学，制造仇恨，崇尚暴力。毛的文革遗产当年经过文革秀才的包装后，具有相当完备的理论形态，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概

括出性质、矛盾、对象、动力、途径等六个方面的要点。本来，这只是文革秀才为毛发动文革寻找说辞的理论包装和欺骗愚弄民众的政治宣传，后来却成为中共官方为毛遮羞的依据，用所谓的“理想主义”来掩盖毛的文革罪责。在讨论毛的文革遗产时，应该特别小心，不要落入官方的这种话语陷阱之中。

### 1 • 1 邓扼杀批毛势头

文革浩劫后，人们痛定思痛，本来可以趁势一举彻底清算毛的罪责，从起草官方历史问题决议前召开的四千人讨论会上群起批毛的气氛，就可以看出当时党内外的人心向背。记得当时听传达，万里在书记处会议上讲，现在是最后一次再提“毛泽东思想”。但是，邓小平扼杀了这一批毛的势头，强调毛功大于过，必须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否则，决议宁可不写！

按照邓定下的调子，当时理论权威胡乔木煞费苦心，试图把毛的晚年错误即文革遗产从官方的意识形态——毛泽东思想中剥离出来，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毛晚年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样一来，毛被高高挂起，让林彪、江青背文革的黑锅，中共官方提出的“彻底否定文革”轰轰烈烈地走了过场，成了烂尾工程，贻害深远。

邓小平刻意维护毛，从私心来说，是不想当中国的赫鲁晓夫，但从政治上来说则是为了保住党天下，不想触动文革产生的制度根源。邓采取实用主义的做法，只在某种程度上与毛划清界限，以此为基础推动改革开放，开创自己的时代。在这一点上，邓小平缺少政治胆识和历史眼光来开创国家真正的长治久安。

其实，邓心里很清楚，对毛的评价经不住历史的检验。九十年代初，邓向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等人承认，当年决议“部分历史是不实的”，对毛的评价是“违心的”，可以在他们这一代走后，再作全面评价。但是，已经坐失清算毛的历史时机，以致造成今天毛文革遗产死灰复燃，困扰中国的局面。应该说，邓对此起了关键作用。

### 1 • 2 邓与毛的历史渊源左右其改革取向

邓小平时代，中共官方对毛文革错误的定性，是按照《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口径，指毛犯有全局性的左倾严重错误，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并推向极端，但没有认真加以清理，而是强调“宜粗不宜细”，文革历史的真相被刻意掩盖起来。

“魔鬼存在于细节之中”，离开了历史细节，一般民众无从了解毛发动文革的真相和罪责。再加上毛的文革遗产与中共官方意识形态的同质性，掰扯不清，结果八十年代官方的否定文革做成一锅抽象否定、具体含混的夹生饭。

另一方面，邓小平主政后实行的跛脚鸭式的改革，造成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不公和民怨，这成为毛的文革遗产复活、兴风作浪的社会土壤。不错，邓主导的改革开放把中国民众从毛时代的贫穷饥饿中解救出来，开始过上小康生活，但其目的主要不是为了民众的福祉，而是为了挽救共产党的一党天下。这是八十年代的改革步履蹒跚，一波三折的根本原因，也是他不能容忍胡耀邦、赵紫阳，接连罢黜两任总书记的原因所在。与胡、赵两人相比，邓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改革派，充其量只是个半吊子的改革派。更深一步说，邓的改革取向，与毛对他有知遇之恩有密切关系，这种情结左右着他的政治判断。

在中共第二代领导人中，邓小平与毛的关系最深。早在中央苏区毛挨整时，邓就是毛派的头子而受到株连，由此得到毛的青睐，刻意扶植，作为接班人来培养，锋头甚至超过林

彪。如在淮海战役中，让邓统领二野、三野两大野战军；在中共八大时，又先林彪一步进入中央常委。中共建政后，邓一度也是积极贯彻毛的左倾路线的得力干将，在许多事情上，邓都难脱干系，如在反右运动中担任前台总指挥；在中苏论战中，邓直接领导反修文件起草小组，参加这个写作班子的康生、王力等后来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

正是由于这种历史渊源，毛虽然对邓小平跟着刘少奇跑不满，在文革中想整他一下，但始终留有余地，强调“邓是内部问题，刘、邓应有区别”，并给予特别关照，允许邓可以给他写信，指定汪东兴负责照顾邓的生活。所以邓在文革中的境遇，与刘少奇、彭德怀那种生不如死的境遇有完全不同。即便是邓在文革中第二次被打倒后，毛仍保留他的党籍，并满足邓的请求，允许他和家人在一起，可谓做到“仁至义尽”。

### 1 • 3 “中国模式”：邓思想和毛体制杂交怪胎

邓、毛之间这种关系，使邓小平对发动文革的历史罪人毛泽东格外宽容，高高挂起，轻轻放过。在维护毛的问题上，他甚至超过党内保守派大老陈云，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邓才是中共党内最大的保守派。这种对毛的暧昧态度，对一党体制的格外看重，决定了邓在政治上的摇摆性，一身兼有改革派和保守派双重角色，只求经济发展，拒绝政治改革。这种跛脚鸭式的改革，催生了“中国模式”的权贵资本主义。

这种半管制、半市场的权力经济——通过权力寻租，通过市场兑现，是中共官场乃至整个社会深陷腐败、道德沦丧的原因。邓小平是始作俑者。邓是一个站在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门槛上半新半旧的人物，他一手催生了改革的胎儿，一手又掐死了改革的生机。缺少了政治改革的制衡，一党体制下的经济改革所释放出来的人和资本的贪婪，必然像当年毛煽动文革狂热一样席卷肆虐整个社会。

六四之后，当邓小平在耄耋之年，终于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中共十四大党章的那一刻，就为权贵资本主义大行其道打开大门。此后，所谓“改革”已经成为权贵集团的专利，造成利益分配格局严重失衡，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广大底层民众沦为改革的牺牲品。

于是，人们开始怀念毛时代的“公平清廉”，把毛看作是反抗社会不公和权贵集团贪腐的旗帜，是人民的保护神。毛的文革遗产更是成为中共党内原教旨派批判邓式改革的利器，社会被严重撕裂，毛左和邓右两种势力水火不相容。这种局面是生前刻意维护毛历史地位的邓小平始料不及的。毛的文革和邓的片面改革，一左一右，共同释放出来的人性恶，摧毁了中国社会的生态环境和道德伦理底线，而这正是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今天必须面对的局面。

## 二、毛的文革遗产反文明反传统反人性

毛的文革遗产究竟是什么，应如何界定？目前学术界有各种说法，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做出解读，五花八门，见仁见智。我不想介入各种观点的争论，因为这对整体把握毛文革遗产的实质并没有多少帮助，更不想陷入中共官方的话语陷阱。这里，只想从宏观上加以界定：毛的文革遗产是中共官方意识形态的极端表现形式，其理论形态是所谓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学说；文革的真实目标是夺权和清洗，换上忠于毛路线的人，最终建立毛氏家天下；文革理论和实践是反文明、反传统、反人性的。

毛泽东是近代中国社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人物，是列宁式极权体制、中国皇权专制传统、中国底层流氓文化的集大成者，他改变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原有的走向。中共官方史学用“革命史范式”解释中国近代历史，把它说成是“两个过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共领导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过程。但是，从一个更宏观的视野里来看，这种说法只是一种表象之谈。

近代中国的百年激荡史，实际上是世界全球化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被动卷入其中，目前这一过程仍未结束，还在继续扩张深化。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毛是中国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失落、抵触、挣扎、反抗、一再挫败，最后选择激进变革，以俄为师，走上共产极权道路的人格化符号。毛把整个国家拖入一场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试验，开启了一个狂热和恐怖的年代。

## 2·1 毛发动文革与“理想主义”无关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路历程，一直可以追溯到中共建政之初，肇端是急于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狂想。斯大林死后，触发了毛争当世界革命领袖的欲望，改变了原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间表，大幅加快对各行各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他与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约定“超英赶美”后，发动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刮“共产风”，结果造成全国性的大饥荒，饿死三千万人。

闯下大祸后，毛拒绝认错，在庐山会议上整肃直言谏诤的彭德怀，从此心魔缠身，自觉在党内日益孤立，大权旁落，更担心自己身后被人清算，落得斯大林一样被人鞭尸的下场。他认定刘少奇就是准备在他身后做秘密报告的人。于是，“中国的赫鲁晓夫”的魔咒驱使着毛像唐·吉珂德一样大战风车，把中国一步步推向通往文革之路。由于刘少奇在党内的势力已经坐大，声望日高，通过正常途径已经难以铲除，只有采取非常手段才能达到目的。发动文革，就是毛孤注一掷而采取的非常之举。

这里之所以概述文革的历史成因，就是不想在讨论毛的文革遗产时，堕入中共官方史学的话语陷阱，把毛发动文革的动机说成是出于“理想主义”的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追求公平完美的社会主义”，“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等，用“理想主义”的锦被掩盖毛的真实动机。

## 2·2 文革：毛个人意志与极权体制结合的怪胎

毛一生嗜权如命，文革十年史就是一部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史，贯穿始终的主题就是确保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要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是掌握在毛及其亲信手里的委婉说法。事实上，毛发动文革非但与“理想主义”无关，反而是出于“宁可天下人负我”的极端自私——先是急于想当世界革命领袖，发动大跃进，闯下大祸后，又怕被人清算，于是先发制人，发动文革，把整个国家拖入历时十年之久的浩劫之中。

顺便一提的是，学术界有观点认为，极权体制是产生文革的根本原因。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这是把主次颠倒了。不错，一党极权体制是毛发动文革的制度平台，但与毛的个人意志相比，是次要因素。试问，同是在中国的一党体制下，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会发动文革吗？同样，前苏联东欧也是一党极权国家，他们那里发生过历时十年之久的毛式文革吗？所以更确切地说，文革带有毛强烈的个人印记，是毛的个人意志与中国一党极权体制结合而产生的怪胎。

## 2·3 毛“人民情结”的背后是要做“千古一帝”

在清理毛的文革遗产时，除了所谓“理想主义”的问题外，毛还有另一个迷惑人之处——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也有必要加以分析。这种说法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上非常虚伪。毛发动文革开的是夫妻店，把党天下变成家天下，由文革派接掌最高领导权，确保自己身后不被清算，人民群众不过是他手中利用的工具。事实上，毛从来不以苍生为念，饿死几千万人，拒绝下罪己诏；还向赫鲁晓夫说大话：不怕打核大战，中国六亿人，死一半还剩三亿。

文革中，毛把群众玩弄于股掌之上，鼓动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为他火中取栗。文革重大事件的背后都有中央文革秉承毛的旨意操弄群众的那只手，当他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呼“人民万岁”的时候，想的是如何把火烧向刘少奇，冲垮党内反对势力。为了政治需要，毛在文革中曾多次变脸，对红卫兵、造反派始用终弃，一脚踢开。

毛这样翻云覆雨，原因在于他刻意表现的“人民情结”和内心深处的“帝王情结”这两个角色的内在冲突：一方面，他故作代表底层民众的姿态，号召他们起来造体制的反；另一方面毛本人就是一党体制的缔造者和官僚集团“最大的官”，享有至高无上的特权。毛虽然对党内官僚集团不满，试图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那不过是“帝王情结”在作祟，嫌官僚集团妨碍他成为名副其实的“千古一帝”，因为共产党的江山毕竟姓党，而不姓毛。毛扶植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建立家天下的企图受到党内官僚集团的强烈抵制，最后不得不妥协，牺牲奉旨造反的民众，回归一党官僚体制，来换取官僚集团默许事实上的毛家天下——由文革派在毛身后掌握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这就是文革实际走过的轨迹。

毛的文革遗产的基本特征是反文明、反传统、反人性的，深得马克思、列宁暴力革命学说的精髓，同时又带有毛鲜明的个性特征。文革中，毛那些充斥阶级斗争、鼓吹暴力、煽动仇恨和斗争哲学的语录成为最高指示，风靡全国，诸如“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造反有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乃至“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八亿人口，不斗行吗？”，等等。在毛歪理邪说的蛊惑挑唆下，整个中国一片红色恐怖，成了人间地狱，顺毛者昌，逆毛者亡。在“革命”的名义下，人命如草芥，揪斗批判，游街示众，私设牢房，血腥杀戮，冤狱遍于国中，上演了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幕。

## 2·3 文革最大的罪恶：泯灭人性，释放兽性

文革浩劫对中华民族精神、传统、文化、道德伦理的摧毁，更是危害深远。毛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他以历史上的专制暴君自喻，不仅暴露了他内心深处的“帝王情结”，而且也可以看出文革与焚书坑儒一脉相承的关系；至于马克思学说，本来就是人类文明在全球化过程中一时因运而生却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乌托邦空想。毛的文革理论和实践把马克思“与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思想发展到极致，乃至到了反人类文明的地步，颠覆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价值观，对中华文明的毁灭程度，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战争。文革期间，中华文明遭遇了一场旷古劫难，整个人文精神体系崩溃，只剩下一个大脑和八个样板戏。文革理念与现代文明更是背道而驰，与普世价值——自由、民主、人权的理念水火不相容。

文革中，中外一切文化传统通通被斥为“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和“封资修”，大张挞伐，就连西洋古典音乐也不放过，自己老祖宗的文化传统更是在劫难逃，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国传统的核心儒家文化。文革初期，中央文革指使红卫兵砸孔庙，烧

典籍文物，毁历史古迹；毛后来还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掘地三尺，把孔圣人拉出来鞭尸。毛如此对待孔子，除了有政治上的需要外，根子在于内心深处的反传统情结和底层流氓文化意识。毛读私塾时，就曾干过砸孔子牌位的事。毛的这种反儒倾向经过五四运动后更加强烈，文革就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一次总清算。人们说，崖山之后无中国。其实，文革才是真正的“崖山”，是对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传统、道德、伦理的“种族灭绝”。

毛的文革遗产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反人类的，摧毁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是非善恶标准与人性道德底线。可以说，文革最大的罪恶在于泯灭人性，释放出兽性，其中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对精神的虐杀，对肉体的残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广西甚至发生吃人的现象。在文革那个狂热的年代，只要是反对毛，就是阶级敌人，就不是人，可以做出任何灭绝人性的事情。父子相残、夫妻反目、亲友揭发、家人背叛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这不是个人家庭的悲剧，而是整个民族的人性沦丧。文革对中国人的伤害，莫此为甚。只有彻底摒弃毛的文革遗产，全民族认真进行反省忏悔，才能使人性复苏，重建中华文明。

### 三、毛是红二代的精神教父

以习近平成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为标志，中国进入了红二代治国的时代。红二代普遍对江泽民、胡锦涛两代治下的社会现状不满。习上台之初，红二代曾举行规模空前的聚会，为其呐喊造势。在讨论毛的文革遗产对习近平执政环境、治国思路 and 模式的影响之前，不妨先来看一下红二代群体的构成、成长环境、政治取向等，这会有助于理解习近平上台后的所作所为。

红二代是近几年蹿红的词汇，与官二代、富二代相对应，取代了以往的太子党、高干子弟一类的说法。首先，从构成上看，指的是父辈曾投身中共革命，参与创建红色江山；其次，从年龄看，大体是40后到60后，以文革前的老三届为主体。可以说，红二代是“红旗下的蛋”，或者说“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当然，这只是一个大略的划分，实际的情况可能有所出入。

#### 3·1 红二代内部等级森严

红二代内部等级森严，分三六九等，呈金字塔形，各有各的圈子。最上面的是中共开国元勋、被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子女；其次是中共建政时，父辈职务是地方省部级以上或军队受衔时少将以上的子女——这两类是响当当的红二代，屡出风头的将军后代合唱团就是这些人，他们是红二代的核心圈子和头面人物；再往下是中共官场中属于高级级别（行政十三级以上）的子女；底层是中共建政前参加革命的子女。后面这两部分占红二代的绝大多数，其中分得改革红利一杯羹的不多，多数只是小康之家，与普通民众无异。

中共建政后，革命开始吞噬自己的儿女，文革中大批共产党干部更是在劫难逃，红二代中一部分人的命运由此发生重大改变，沦为政治贱民，由红色贵族变成“黑帮子女”和“狗崽子”。习近平就是文革前家庭遭遇变故的红二代。这里，需要注意文革前后的区别，这对理解习的性格为人很重要。由于文革前政治运动的波及面相对小一些，挨整的人及其家庭处境孤立，更容易被人歧视，同时这些子女年龄相对较小，正是性格形成的时候。习近平在其父落难时，只有九岁，严酷的环境直接影响到性格的形成，更善于隐忍韬晦，深藏不露，这是他与薄熙来的张狂跋扈不一样的地方。原因在于薄一波在文革中倒台的时候，薄熙来是高中生，性格已经定型，虽然他当狗崽子时也要靠隐忍生存，但一旦环境改变，以往张狂的性格就会旧态复萌。

### 3 • 2 文革是红二代的青春情结

尽管红二代们后来各自的命运经历大不相同，但他们成长的环境是相同的，是喝党文化的狼奶长大的，毛泽东是他们共同的精神教父。红二代成长的年代，正是中共官方所说的毛的左倾思想急剧发展即向文革一路狂奔的年代，他们青春期躁动的思想也正是定型于文革期间。文革可以说是他们的青春情结。毛的敌对思维、斗争哲学，崇拜暴力，挑动仇恨等思想，深入红二代的骨髓，成为他们的红色基因。

譬如，文革中大行其道的毛语录“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等等，都已经融化在他们的血液里，成为集体潜意识和思维定势。

由于红二代的成长环境先天不足，完全被极权政治所主宰，他们的政治狂热到了一种违悖人性的程度，更形象地说，他们是疯狂时代产下的畸形儿。一方面，他们在上学的年龄，被剥夺了读书的机会，而且被灌输了一整套毛思想中的歪理邪说，知识结构残缺不全，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另一方面，他们自视根红苗正，血统高贵，有强烈的“红色江山意识”，热衷参与政治，内心有强烈的愿望和激情去捍卫父辈开创的革命事业，保卫最高领袖，保卫党，保卫红色江山。红二代后来虽然经过命运浮沉和人生的摔打，其中不少人经历了失落、怀疑、幻灭的过程，但从整体而言，这种以保党天下为己任的人生底色始终保留下来，经过岁月的沉淀，转变为现实政治中强烈的掌权意识。

### 3 • 3 在崇毛、家仇上红二代陷伦理困境

在如何对待毛的文革遗产的问题上，红二代普遍陷入一种内心挣扎的困境：一方面毛是他们的精神教父、红色江山的开国之父，另一方面他们的父母在文革中又遭到毛的整肃，家破人亡。这一点，在红二代头面人物的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现代精神分析学有一个术语——俄狄浦斯情结，说的是古希腊一个弑父恋母的悲剧故事而陷入伦理困境。红二代在崇毛和家仇的问题上，就陷入类似的伦理困境。

在红二代中，刘源、薄熙来、孔丹等人的父母都在文革中死于非命——刘少奇被活活整死，死后连姓名都是假的；薄熙来的母亲胡明在被押送回京的火车上死得不明不白；孔丹的母亲许明因江青点名，自杀身亡。此外，林彪之女林立衡，陶铸之女陶斯亮也是同样的遭遇：林彪被迫离国，死无葬身之地，被苏联人割去头颅；陶铸则是在重病中被强迫与家人生离死别，最后一人孤独死去。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也在文革中被关押多年，劫后余生，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认得了。顺便一提的是，人们普遍认为习近平受其父牵连，因而对毛怀有怨恨。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毛对习家是恩大于怨。当年长征初到陕北时，毛对习仲勋有救命之恩，后来虽又整了他，但那是为了反击彭德怀的翻案，铲除西北山头，习父遭池鱼之殃。

虽然这些红二代的头面人物在文革中的遭遇不堪回首，但他们却无法像普通人那样公开诉说自己父辈的冤死，更不要说伸张正义，告慰父辈的在天之灵。红二代中除了少数对文革有所反思外，如陈毅之子陈小鲁、罗瑞卿之女罗点点、马文瑞之女马晓力等，多数人对文革的态度暧昧，避免公开批评文革，往往轻描淡写，避重就轻，一笔带过。

### 3 • 4 红二代崇毛实为政治算计

在这方面，刘源的表现很有代表性。他在回忆文革经历时说：“从十几岁起，我就在鞭子下劳改，在镣铐的紧锁中淌着鲜血。多少年，在几千个日日夜夜里，每小时我的心都在流着血和泪，每时每刻都忍受着非人的待遇和压力。我紧紧咬着牙，不使自己变疯。”但在谈到文革祸首毛泽东时，却又竭力为他开脱，说：毛做了许多错事，也做了更多的好事，毛搞文革的动机不坏，只能算渎职；父亲虽然惨死，但作为二把手，没有制止动乱，也是大错。

刘源这样为毛开脱，当然不仅是崇毛情结作祟，其中还有政治算计；但无论如何，这已经逾越了人伦底线。毛本来对他们有杀父弑母之仇，但饮水思源，毛是红色江山的开创者，是他们心中的大英雄和手中权力的来源，最后崇毛情结和政治算计占了上风，家仇搁置一旁，还美其名曰“照顾大局”。子报父仇是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而刘源们非但不能为父母的冤死伸张正义，反而还要把文革的罪魁祸首奉为神明，顶礼膜拜。这是一种何其荒诞的精神错乱！况且文革浩劫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家仇”，而是中华民族的“国殇”，无数在文革中惨死的冤魂至今仍在冥冥之中游荡，不得安息。

### 3 • 5 毛是红二代掌权的政治资产

掌权的红二代用“红色信仰”、“江山意识”、“大局意识”来为自己崇毛辩护，统统不过是托辞，是为了共同分享权力的盛宴。其中最具有象征性的莫过于前些年王光美出面宴请毛的家人，毛、刘两家“相逢一笑泯恩仇”，握手言欢；她还特别以“毛的学生”在韶山毛纪念馆留言。难道她真的忘了刘少奇在文革中是如何惨死的，忘了自己备受屈辱的经历了吗？当然不是，她这样做，就是为了从政治上给刘源的上位铺平道路。

红二代的头面人物对这种做法心有灵犀，为了上位，都上演过类似的戏码。习近平在上台前曾三次上韶山参观毛的故居，留下一句肺腑之言：“没有毛主席，我父亲早就被杀害了，哪里会有今天的我！”，感恩之情溢于言表。薄熙来被发配重庆，为了重回北京问鼎中央，打的也是毛牌。他曾私下表示：想来想去，只有毛思想才是党内正资产，要回到毛。他搞“唱红打黑”就是从中获得的灵感。总之，毛是他们的精神教父、政治上的领路人，有着剪不断的精神血缘关系。掌权红二代的政治生命、思路和手段都来源于此。

（未完待续）

□ 来源：《美国之音》网站

~~~~~

#### 【抗拒遗忘】

唯一文革博物馆消失意味着什么？

• 蔡慎坤 •

位于广东汕头澄海区塔山风景区的文革博物馆，是中国唯一以反思文化大革命为主题的纪念场所，但如今，博物馆内所有的石刻资料，包括石碑、牌坊、遇难者碑文、历史展览等资料被水泥覆盖。广场上名曰“塔园魂”的巨大石碑，也被巨幅海报遮盖，所有涉及文革的元素几乎消失殆尽。

博物馆创办人、前汕头副市长彭启安对媒体称，去年5月，他已将塔园交给塔山所属的涂城村村委会管理，不再参与相关事务。“这件事肯定不是澄海、汕头决定的，肯定是上面



指示的事。”彭启安曾表示，希望文革博物馆可以完整保留，后人以史为鉴，反思文革，但“他们好像回避这些东西”。

媒体引述当地村民的话说，文革博物馆已经面目全非。入口的牌坊原本刻着“首座文革博物馆”七个大字，现在被一张写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活动”字样的红黄相间横幅遮住，两侧的“天壤独存浩劫史，人间最重是非心”的对联，以及“反思”“惊醒”字样，则分别被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印有党徽、五星红旗的海报覆盖。

广场上一块约20公尺宽、5公尺高名曰“塔园魂”的巨大石碑，原刻着已故前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所题的“要以史为鉴千万不要让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不过，日前已经变成宣传“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巨幅海报。碑林中刻有各地名人题词的石碑也被一系列“核心价值观”海报遮住，叶剑英铜像和藏有众多资料、文物的塔楼则被竹棚、塑胶板围住。

该博物馆在1996年由前汕头副市长彭启安筹资兴建，2005年对外开放，其间彭启安与一班当地老干部承受了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

文革博物馆本来应该建在文革的爆发地北京，可悲的是，由于官方并未彻底否定文革反思文革，筹建文革博物馆只是在民间有行动，没想到在文革爆发50周年之际，首座民间文革博物馆也被肢解，可见官方依然忌讳文革，想继续淡化文革，不让人们纪念文革反思文革，更不让人们把今天的现实与文革产生太多联想。

著名作家巴金先生是文革的亲历者参与者受害者，他生前曾一直呼吁在中国建立“文革博物馆”，让人们能够铭记文革彻底反思文革，并提防文革悲剧在中国不断重演。

巴金先生曾专门撰写过《“文革”博物馆》的文章，呼吁说：

前些时候我在《随想录》里记下了同朋友的谈话，我说“最好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我并没有完备的计划，也不曾经过周密的考虑，但是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这是应当做的事情，建立“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

我只说了一句话，其他的我等着别人来说。我相信那许多在“文革”中受尽血与火磨炼的人是不会沉默的。各人有各人的经验。但是没有人会把“牛棚”描绘成“天堂”，把惨无人道的残杀当作“无产阶级的大革命”。大家的想法即使不一定相同，我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决心：绝不让我们国家再发生一次“文革”，因为第二次的灾难，就会使我们民族彻底毁灭。

我绝不是在这里危言耸听，二十年前的往事仍然清清楚楚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无数难熬难忘的日子，各种各样对同胞的伤天害理的侮辱和折磨，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忠奸不分、真伪难辨的大混乱，还有那些搞不完的冤案，算不清的恩仇！难道我们应该把它们完全忘记，不让人再提它们，以便二十年后又发动一次“文革”拿它当作新生事物来大闹中华？！

有人说：“再发生？不可能吧。”我想问一句：“为什么不可能？”这几年我反复思考的就是这个问题，我希望找到一个明确的回答：可能，还是不可能？这样我晚上才不怕做怪梦。但是谁能向我保证二十年前发生过的事不可能再发生呢？我怎么能相信自己可以睡得安稳不会在梦中挥动双手滚下床来呢？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见巴金《随想录》）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5·16”通知，文化大革命就此拉开了帷幕。毛泽东发动文革，目的是要打倒政敌刘少奇，但刘少奇当时是国家主席，要打倒他，发动红卫兵造反是最好的一种方式。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并对宋任穷女儿宋彬彬说：“要武嘛。”红卫兵就铺天盖地席卷而来，武斗之火在全国熊熊燃烧。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提出打倒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于是踢开党委闹革命，砸烂公检法，各级当权派几乎人人挨斗，站乒乓球桌，戴高帽，游街示众。

文革作为一场人神共愤的大浩劫，虽然过去40年了，时至今日，我们并没有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来，无论是文革的受害者还是文革的加害者，都在小心翼翼的守护着文革的禁区。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体制在文革之后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文革的基因文革的土壤依然存在，文革的遗毒常常以不同方式在神州大地泛滥。

过去40年，中国对文革的反思远远不够，尤其是权力没有监督，个人崇拜盛行！而绝大多数文革史料，要么被封锁在黑箱中，要么腐烂在人们的记忆中，老一辈三缄其口，新一代不求甚解。那些在文革中造反出尽风头的人，许许多多变成今天的决策者乃至最大受益者。

在这种状况下，要中国人反思文革很难，要权贵乃至利益集团反思文革更难！因为，文革的历史包袱都是沉甸甸的，似乎只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才是中国的传统思维。于是，反右只是什么“扩大化”、大跃进只是“天灾”、文革不过是“动乱”……这些重复的历史悲剧因为反思的缺失而绵延不绝，中国一路走来气喘吁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文革制造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断层，直接导致社会道德全面沦丧，信仰缺失世风日下腐败泛滥，也为今天中国人个体良知的泯灭和反省能力的匮乏创造了条件。

更为奇葩的是，文革的罪孽乃至对民族传承的破坏也没有得到清算，文革的戾气和恶习仍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文革中的冤魂仍在呻吟，那些血债累累的坏人恶人，绝大部分安然无恙，那些不幸死去的亡魂也仍然没有得到解脱和升华，今天每一个迷失悖逆的中国人，依然可以在文革的浊流中找到真正的病因。

而现在，唯一一座文革博物馆的消失，是否意味着一场新的文革又会不期而至？

□ 来源：《中华网论坛》

~~~~~

【亲历者言】

我的文革

• 阎长贵 • 徐友渔 •

受访者：阎长贵

访谈者：徐友渔

时间：2014年5月4号

徐：各位网友大家好，现在又到了谈论文革的时候了。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的嘉宾是阎长贵老师。阎长贵老师是文革期间江青的第一任秘书。他的亲身经历会非常的有启发性，有意思的。阎长贵老师的专业是历史。除了自己在文革期间有非常重要的经历以外，他自己也写了很多书。这是新近出版的一本（《问史求信集》）。他不光是讲自己的亲身经历，而且使用历史学家的眼光来考证文化革命的事情。因为关于文化革命有大量的、错误的说法，很多剽窃的东西、生编硬造的东西。阎老师是非常不满意。他写这种书就是来订正这种事情。阎老师当江青的秘书只当了一年。江青是个喜怒无常的人，一年之后以莫须有的罪名把阎老师打成反革命，就关到秦城监狱，关了七年多（将近）八年的监牢。当然他现在年龄很大了，也是壮心不已，在文革方面的研究开辟了很多新的领域，做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首先，阎老师你当江青的秘书，你感觉到，像你这样她手下的人，他是什么态度？她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高官，还是一个颐指气使的贵妇人呢？你的亲身感受是怎么样的？

阎：我跟江青当秘书是戚本禹推荐的，戚本禹做了主要的推荐作用。因为我帮戚本禹做了一些工作。戚本禹和江青关系很好。戚本禹和毛主席、江青关系非常好。我跟你讲一件事，有个保健医生叫李志绥，他给毛主席看病要向汪东兴汇报，给江青看病要向戚本禹汇报。所以他跟江青关系是很好的。戚本禹和江青的关系，要好于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的关系。所以他跟江青关系非常好。后来代替田家英当秘书室主任。所以他就在秘书室做主席的工作。所以江青跟他讲一句话，在主席身边工作最忌讳结交诸侯。这诸侯包括中央的，也包括地方的。这是当秘书的很重要的一条戒律。所以当时江青评价田家英，说他一仆二主。就是说在毛主席和刘少奇之间，是这样（这么个意思）。（徐：这话很尖刻，一仆二主）所以田家英（被）打倒了，戚本禹接替了秘书室主任，秘书室工作。秘书室主任，副主任，后来改秘书局了。（徐：他推荐你当江青秘书）他推荐的。我在江青的一年，我觉得江青还像一个正常人。她对工作人员不像后来，后来工作人员写的是（她）对工作人员张口就骂、动手就打，我还没见到。骂我见过。经常就说，你个人主义，你怎么不好，你给滚，说这种话。不像后来说那样，不像67年。她说她是政治化了的人，除了工作以外就没有其他的了。过去不是玩猴子，玩狗。她那一年什么活动也没有，打扑克，玩狗玩猫，什么都没有，什么骑马，开汽车，什么都没有。那年就是搞政治，那年全心全意策划文化大革命。江青是副组长，陈伯达是组长，江青是不是组长的组长。她是很厉害的了。

徐：那她对你们？

阎：对工作人员当然是，江青难伺候那时候还不是很明显。

徐：因为说江青难伺候是一句很著名的、当时流传很广的话，你的感觉还不是。

阎：我在的那一年，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常的。当然以前，在去给江青当秘书以前。我就给江青办信组工作过，处理江青群众来信。我是江青办信组的负责人。跟她熟悉了。她选秘书的情况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她没秘书。她当时跟她的一个警卫员，都是喊他孙秘书。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江青说你啊，还有一点劳动人民的味道，没被化掉。当时说“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嘛”。当时大学以后的情况不就是这样嘛。我还有点劳动人的味道，还没化掉。对我应该是很高的评价。我当时不知道江青是什么意思。我就说感谢江青同志对我的评价。所以这个评价当时是很高的。（这是）去以前。结果到她那去了以后，她一个月不

理我。我只是收发文件，我是机要秘书收发文件嘛。收完文件以后，不能自己处理的，要通过警卫员，原来代替做秘书工作的警卫员处理的。还有发文件也是她交给警卫员，警卫员交给我。一个月没理我。我跟戚秘书说，戚秘书收文件呢，说这样当秘书没意思，我还不如。当时工作人员办公室16楼，江青11楼，江青代号不是‘11楼’嘛。我说还没在16楼工作好呢，工作有意思呢。我说“这样当秘书没意思，为什么啊”。戚本禹说“我也不知道”。后来我就憋不住，我就问警卫员孙立志。说这叫试用阶段，这在试用你，所以她不理你。第一次谈话一个月以后，和我正式谈话，第一次谈话。

徐：那后来见面是怎么样一个情景呢？

阎：我是1月9号去的。我给江青当秘书是365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我是1967年1月9号去的，1968年1月9号被隔离审查的。所以365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她提到我谈话是一个月以后。怎么回事呢。戚本禹是办公厅秘书局，后来秘书室换秘书局了嘛，他是秘书局的副主任，主任当时可能是童小鹏吧。去办公厅工作。因为他夫人他老婆就在办公厅秘书局工作。他工作18年嘛，他工作很熟，基本都知道。他就告诉我，当时办公厅分两派。汪东兴支持一派，戚本禹支持一派，两派斗争也很厉害。戚本禹这一派受到压制，压制的很厉害，谁呢？受到汪东兴的压制。汪东兴说，不是秘书局还有个机要局呢，机要局那一派被打成反革命了。秘书局一派，戚本禹一派说跟他是孪生子。孪生子嘛，那边是反革命这边也是反革命了。所以受压的很厉害。戚本禹就说派我，你能不能到秘书局去了解一下情况。那我说可以去啊，戚本禹派了我好多事情。因为文革中戚本禹也工作，做了好多事情。戚本禹就叫我去吧，去了解情况。（怎么）去了解情况，戚本禹都告诉我了，（找）哪些人都是他告诉我，去找谁找谁。后来以后，我就写了报告。报告怎么写的呢“本禹同志稟江青同志”。报告写完了拿给戚本禹一看，戚本禹说“我不管”。我说“诶，怪了，你叫我去了解情况，你怎么不管呢”。他说“我不管”。我说“不管怎么办”。我当时一也年轻气盛。他说“我不管”。他当时将我的（报告）卷了。他说“你敢不敢把这个材料送给江青同志”。我说“哪有什么不敢的呀，我去了解情况我有什么不敢的啊。可以啊。”那我就立刻从戚本禹办公室回到我的办公室。从16楼回到11楼。我就把戚本禹勾掉，又重抄一遍，光写江青。江青第二天，拿到这封信以后第二天就找我谈话。她说“你说的情况也可能是对的。我从别的渠道也听到了，但是这件事情你不要去管了。从今以后你就在我这工作。我们都是党员，你要对党负责，对我负责，这是纪律。从今以后其它任何人不能再分配你工作或任务。”她看出了这个不是个人行为，是别人派你去的。

徐：刚才阎老师讲的有几个奥妙，我都体会到了。第一个奥妙是戚本禹叫你去做这件事，但是他最后又要摆脱关系，说我不管。就是他又要指使你去做这件事情，他又要摆脱关系？

阎：江青给他批了几个字，戚本禹不是原来办公厅的，秘书局的嘛。（就批）这件事情戚本禹同志去管。他不就师出有名了嘛，名正言顺了嘛。江青说这事你不要去管了。

徐：其实很复杂，戚本禹的政治对手是汪东兴。江青也不便管。你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毛头也不懂。所以她交代你当秘书应该怎么当。这看起来政治是件很复杂的事情。那阎老师我问你，你给江青当秘书的时候，江青是文化革命的第一副组长。他虽然是第一副组长。但我们都知道，有很长一段时间，陈伯达实际上是一个摆设，起的作用并不大。实际上江青有一点太上皇的味道。那据你的近距离观察，江青在文化革命中间跟其他的那些威高权重的成员之间，他们的关系，他们工作状况是怎么一回事？？

阎：这里有一个变化过程。一开始江青还是很尊重陈伯达的。因为毕竟是组长啊，她是副组长啊。一开始整件事可以讲，陈伯达病了也需要住院。他就说叫医生把医疗器械搬到这里来

检查，搬到钓鱼台来检查。要帅不离位。因为陈伯达是文革组的帅啊。帅不离位。后来医生讲仪器很多，很难搬来，不好弄。那没办法就只好住院嘛，住301医院。这一段，文革小组是5月28号成立的。这是8月中旬的事情。在前一段，陈伯达主持会议还是干什么，说话有力，有权力。（徐：还说话算数的。）8月30号有个通知，中央有通知。说在陈伯达同志住院期间和外出期间，中央文革组工作由江青同志主持。从这以后，到陈伯达出来。陈伯达基本上失去了掌握文革的权力。说实在话，毛主席要江青主持，就是要江青掌握中央文革组。

徐：那陈伯达还是对权力很看重的人，那这会不会引起陈伯达和江青的矛盾，或者陈伯达难不难受？

阎：陈伯达这个人他不是外号叫“老夫子”嘛，是个书生。这个人，应当说是有学问。学问最大的。在中央领导人中，学问应当是比较深的。比胡乔木知识要广博，思想要深刻。因为谁不知道陈伯达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总理都多次讲，陈伯达是我们党内最能把毛泽东思想融会贯通的人。陈伯达当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胡乔木当时是候补书记吧。特别是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就是8月1号以后，8月12号选举以后陈伯达成常委了。在当时陶铸在的时候，是五号人物了，权力很高了。那是常委了。就这样，后来也不行。江青这个地位啊那是非常高的，非常突出的。所以曾志讲过，陶铸夫人讲过，江青是毛主席夫人这个地位比政治局委员都重要（徐：当毛泽东的老婆比党政治局委员还重要。）她在文革以前跟毛主席到广东去。看文件的时候，政治局寄的文件，都可以看的。她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她政治局委员比常委权力都大。我跟你说，哪一个常委出去游玩，去玩，去休养，海南也好，青岛也好，要政治局委员陪同的？她到青岛，到海南去玩，三亚去玩，吴法宪，吴法宪那时候是政治局委员。她到青岛去玩，有两个政治局委员，吴法宪，李作鹏两个（陪同）。哪一个政治局常委有这个（待遇）？没有吧。江青的权力啊、地位啊、特权很高。举个例子来说，1966年8月18号，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第二天8月19号。你看人民日报报纸怎么报道这的呢，这次是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是陈伯达主持的。怎么报道的呢。正文当中是这样报道的，而题目就上提要的就这么说的“毛主席，林副主席”林彪是副主席了，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和江青同志，接见了红卫兵代表”（徐：喔唷，我们都没注意到。）当时我看到没觉得是怎么的。现在看着是个谜。但是，是永远解不开的谜，这个谜现在绝对说不清楚了。说“参加接见会的还有陶铸”陶铸是四号人物啊。这个看着，是个谜啊。中国很注意这个排位的。

（徐：排位是非常讲究的）排位是非常讲究的，这样讲也没见毛主席提出批评。（徐：四号人物都是被“还有”）“还有”这个陶铸什么的。报的接见红卫兵代表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江青同志接见红卫兵代表。不仅正文，上了提要。所以江青的地位，我现在不敢说是谁出的这个主意。是不是陶铸？陶铸当时是宣传部长了，管这个了。是不是他出的？还是另有高人出这个主意。如果没有人（说），谁敢这样报道啊。新华社敢这样报道啊？他新华通讯社写的，我看他也不能这样报道。江青的权力大，那是非常大的。

徐：那阎老师根据你的讲述，江青处在那么高的地位，她的权力来源显然是毛泽东了。依仗她毛泽东夫人的那种身份。那她跟毛泽东的关系是趁毛泽东要搞文化大革命，搞了一些自己的东西结党营私呢？还是忠实的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据你的体会和观察，她是哪一种情况？

阎：我看是执行毛主席指示。文革中重大战略部署重大决策，都是毛主席决定的。江青自己，我刚才不是讲了嘛，“从五月通过以后，我没有自己的主意，都是中央的部署，毛主席的部署，或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她不是这样讲的嘛？她的地位，陈伯达后来也讲啊（他回来以后权力就小了），陈伯达在常委会上公开讲啊，我不过是个刘盆子。（徐：古人，就是说傀儡的，软弱无力的这种人。）陈伯达也是看江青眼色行事的，包括康生。（徐：连康

生？）连康生都这样。（徐：（康生）跟陈伯达都是看江青脸色行事的？）对，在文革初期，直呼江青其名的，除了毛主席以外，就是康生。从延安下来提干的。康生比毛主席小五六岁吧。他1898年的，毛主席1893年的。毛主席都说“康老”啊，习惯叫法。所以当时戚本禹跟我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康生怎么样。虽然康生直呼江青的名，并不说明康生不怕江青，对江青不尊重。甚至后来康生给江青写关于八大的中央委员的情况。“呈江青同志亲启”啊。信是这样写的。所以这个事情，江青的地位是（相当高的）。开会听江青讲，她都是什么都讲，什么都可以讲。他如果和陈伯达在开会的时候发生争论的话，陈伯达就会把江青叫到另外一个房间里，他俩商量通以后回来，别人就在这里等着，包括康生。所以我说江青在文革中专政啊，那绝对是专政啊。

徐：那江青跟总理的关系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总理的资格非常之高，照道理，江青应该很尊重总理。但是好像反过来是，总理尊重江青表现的更明显一点。你的观察，是怎么回事呢？

阎：这个可以说是很大的问题。现在（谈）这个问题书很多了。我不同意这些观点。现在好像又很多人写。反正很多人都这样写吧。说江青文革一开始就要打倒周恩来，就把周恩来视为眼中钉。我不同意这个看法，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

徐：那是怎么一个情况呢？

阎：我在的时候，在的一年当中，总理经常去看江青。他去以前首先就是给我打电话，给我联系。总理说，总理很客气，总理非常平易近人，对工作人员那是跟江青不一样的，非常客气，他说“长贵同志啊，江青同志在干什么？是工作还是休息啊？我想到那去一下。”所谓休息就是睡觉，那当然就不去了，所谓工作就是看文件。总理只要打电话，（我）就报告给江青。在这一年内，我发现江青没有一次说总理不能来，没有一次是这样。总理要来，可以，完全可以，来就来吧，欢迎来。江青就这样的态度。

徐：那这说明两点。第一点，总理对江青还是格外的尊重，想见他都要那么客气地要征求意见。但是江青对总理也是格外的尊重，每一次总理求见（阎：不是求见，不是求见）总理想见，都是允许了的，没有什么犹豫的，是吧？

阎：为什么这样？我有个考虑。总理为什么要找江青？因为在文革小组啊。因为二月逆流，就是1967年2月16号大闹怀仁堂以后吧，不是成立了一个中央文革碰头会嘛，就是中央最高的决策和议事机构。这个会议是谁主持的呢？是总理主持的。商量问题啊，江青就有一票否决权了。总理为了节约时间就要和江青商量。（徐：事先沟通？）事先沟通，商量，（徐：江青不干就不行？）我想是这样的。我是没当过兵的，我是个书生，我还代替扮过警卫员。1967年4月份，原来是警卫员孙立志说他有肝炎。肝炎不是传染病嘛，要离开首长。当时警卫局啊，办公厅啊，派了一个人给江青，警卫员。干了一天，江青就来给我说，我怕见生人。江青毛病很多，怕见生人，一见生人，出汗。她说你给我扮一天警卫员吧。我说我没当过兵，我一点警卫知识都没有我怎么当呢？她说当警卫员不就是跟我出去吗。

（徐：就是跟她出去）那我也不好推辞。我比江青矮，江青比我高一些。我跟她配衣服都配不上。所以被带着，我见过总理不止一次，坐江青的车。江青没坐过总理的车。为什么总理要坐江青的车。江青地位跟总理没法比啊。总理那是三号人物，全国威望很高的。为什么？当时我想过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他们谈了什么，就是说总理和江青商量问题，讨论问题。就是说他主持会议啊，文革碰头会啊，商量问题，因为江青权力很大。他们谈什么，我没注意。但有一件事情，总理说现在好了，有主席、林副主席给我们掌舵，具体事情我们来做。我倒没听到江青有什么反应。总理坐江青车我是见过的。

徐：那根据阎老师谈的可以说明两点。第一是江青位不高，但是权很重。另外一点，周恩来实际上是非常善于人际沟通的。他知道江青的特殊地位跟特殊权力，他在每次开会做决议之前事先要跟江青沟通，事情才办的好。是不是这样？

阎：我看是这样，大概确实是这样。

徐：总理跟江青之间其实是工作上合作的很好，而且个人的人际关系也是很好的。

阎：这一点我问过戚本禹，江青和总理关系怎么样？戚本禹这么说的，江青和总理的关系那是很好的，这是非一般中央领导人可比的。江青敢在总理面前发脾气。他说这就证明他关系好的一种表现。她不敢在刘少奇面前、林彪面前发脾气。戚本禹说这话，这是文革以后了，写回忆录的时候。我看戚秘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视角。

徐：但关于跟林彪、叶群之间也是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阎先生，据你看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是应该跟周恩来不一样了？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阎：这个应该说是这样。我看到的江青和林彪和叶群的关系啊，主要通过叶群表现出来的。林彪和叶群我见到他们就看过一次江青，到钓鱼台11楼看过江青。林彪去了以后啊，就坐那话也不说。他也不用上水，他也不喝水。林彪是不喝水的。那一次是江青拿着几幅字来。就是毛主席给江青写了好多字。现在A4那种纸吧，反正就那么大。写了好多，有多一点的小一点的。拿了几幅字来送给林彪，江青说有几幅是送给老夫子的，送给陈伯达的，这几幅送给林副主席。林彪没表态，不吱声。没说什么。叶群说了一句，“我们是一介武夫”。林彪是一直不表态，没吱声。他这个性格就那样。（徐：那至少还是把架子端起了的？）还不是说摆架子，他就那样。（徐：林彪就是这样的人？）叶群巴结江青那可是巴结（的很厉害）。所以她有个话嘛“林彪是紧跟主席的”。主席说怎么办，他就在批语上画圈呗。他不是签字嘛。现在不是登了两篇文章，说是替他写字的。学林彪的字，替他签字。林彪身体不好，在我的这一年当中，叶群经常给我打电话。因为她不是接见群众很多嘛，文艺演出很多。她打电话问我什么，就是问我“今天这个演出或者是今天这个接见，江青同志去不去啊。”我就问她“你去不去啊？”因为江青去不去有时候我也知道。我不知道我的就去问她去不去，回来告诉她（叶群）。因为他来电话问嘛。还有打电话说，江青同志想吃什么东西啊，你们那里搞不到的话，我们可以想办法搞。我就烦她，我就是个小知识分子，还是有清高。我说这怎么都可以贪污了。我没给去江青报告（徐：你也不屑于给她传达这些话。）她（江青）有自己的管理员，给她服务的，她要吃东西还搞不到啊。何必要你去找呢。所以这事我没汇报。有一次派林立果，老虎啊，林立果不是叫老虎嘛，送来两个西瓜，夏天，北京还没西瓜的时候，那是南方的西瓜成熟早嘛，送给江青。放到我这，老虎就坐在我的办公室，我就跟他聊天。我看着挺老实的呀。（徐：当初的林立果还比较老实。）我比他大七八岁吧，他是1945年的，我是1937年的。我问他一句，（他）说一句，不问也不吱声，挺老实的，印象不错啊。就我在的一年，我说不出江青和林彪关系是好是坏，我说不出来。说好，我举不出例子来；说坏，我也举不出例子来。但是江青第二任秘书讲了一句话，他是这样讲的，九大以前，江青告诉他说，叶群这人点子很多，有些问题怕将来说不清楚，凡是我和叶群通电话，都要记录。他给我打电话要记录。我给他打电话，我跟你说了，你也要记录。我在的时候没这个现象，没遇到这个现象。这是九大以前。总理打电话，王力打电话不要记录。（徐：他有记录就意味着还是留了一手，防着的）留了一手，将来怕说不清楚啊。这就说明她有芥蒂了。（徐：有戒心，有很强的戒心）我在的这一年的，没遇到过这个问题。总理跟汪东兴打电话不要记录。那时候对总理还是信任嘛。我说的一句话，给总理写的一句话，对我影响很大很直接，就是1967年“二月逆流”的时候。当时不是有写总理

大字报的吗。很多的地方，北京可能也有，写大字报的。当时我受陈伯达、江青委托。我没当江青秘书以前啊，去北大找聂元梓，到清华找过蒯大富派人到天安门“覆壁”（徐：把攻击总理的大字报覆盖掉）覆盖掉，做过这个事情。当时不允许，文革小组和主席都是不允许给总理写大字报的。有一次我拿着可能是总理大字报的事情，我就问江青这件事情怎么办。江青跟我说了句这话“凡是涉及到总理的事情，我心中不安。”凡是涉及到总理的事情我心中不安。这件事情对我影响很大，非常直接。就什么程度呢，你看“二月逆流”，大闹怀仁堂2月16号。16号晚上，也可以说是2月17号凌晨，就是大闹怀仁堂以后吧，看总理没把它当作一回事，说实在话。谭震林、陈毅、叶剑英发脾气，总理没当回事。他不是接见财贸口代表，就是敖本立他们的嘛，当场就把财贸部的副部长朱祥光（音）抓起来了。总理说：“谁叫你来的？我今天接见造反派，你来干什么？谁叫你来的。”造反派叫他去的。说：“你退出去。”他没退出去，总理就马上叫人把他送出去，把他推出去了。有可能是抓起来了。不知道。总理不当回事。毛主席对“二月逆流”，当天晚上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就跟江青报告了这件事，大闹怀仁堂的情况嘛。大闹怀仁堂，现在文件中（写）的情况不一样，有的是打了引号，有的是不打引号。戚本禹告诉我不要打引号，就是大闹怀仁堂。戚本禹告诉我。他改我的文章就是大闹怀仁堂。你给毛泽东撰稿也是有的地方打，有的地方不打，就是不要打引号，就是大闹怀仁堂。当时就是谭震林、陈毅。所以2月18号，18号晚上。毛主席找总理，找几个人大发脾气。说陈毅当时提到整风，延安整风，这次被打倒了。你看斯大林相信赫鲁晓夫，后来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毛主席当时相信刘少奇，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毛主席给打倒了。所以毛主席大发脾气嘛，说文革小组叫陈毅组长，谁当副组长？不行把王明请回来。大发脾气嘛。文革小组开碰头会嘛，当时总理主持了，批评谭震林，批评陈毅，还有徐向前，主要是这三个人。你看江青的权力非常大。

徐：那阎老师，你在江青手下工作。实际上也是忠心耿耿，勤勤恳恳。后来江青怎么就翻脸，就把你打成反革命？你也不会做什么反对他的事，你说你这遭遇是怎么回事啊？

阎：大的背景是王力、关锋倒台。王力、关锋是1967年8月30号隔离审查的（徐：720事件之后。）关锋是我的老师。我1961年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红旗》杂志，分配到关锋那个组，中国哲学史组。《红旗》杂志成立了中国哲学史组。关锋在《红旗》杂志地位很突出的。《红旗》杂志成立中国哲学史组干什么？那就是关锋在那个地方就是引灵设庙吧。关锋在中国哲学史界不是有点名气嘛，跟冯友兰对立嘛。

徐：关锋在中国哲学史界还是真有点功夫的，有点根底的。

阎：所以连冯友兰都讲，批判我的文章很多，他认为关锋的文章水平是最高的。

徐：所以你因为跟关锋有这种渊源关系，所以你倒霉。这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

阎：这是大的背景。

徐：那具体的？

阎：具体的我跟你讲。当时江青跟我说，现在你在我这儿工作，我的压力很大。

徐：什么意思呢？

阎：因为关锋出事了以后，我们单位包括你们，当时叫学部，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学院，就是政研室，有人写我大字报。说关锋是反革命，阎长贵是反革命，因为阎长贵是关锋的学



生。阎长贵在江青身边工作，我们不放心，（是）定时炸弹。把这些材料，我都送给江青了。我也不能不送给江青。江青说了一句话，跟关锋在一起不一定是坏人啊，不一定是反革命啊。这句话，江青对我还比较信任，对我半年多的工作还是比较信任的吧。我当时听了，可高兴了。

徐：但是她总不能因为你和关锋的关系，最后把你……

阎：对，这是讲的背景。导火线就是当时北京电影制片厂一个演员或者工作人员，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写了封什么信呢？这封信很长。我的工作很忙。收发文件很多，电话也很多。这封信很长，一万多字，分好几次才看完。她讲了历史上（自己）也叫过江青的名字，也叫过这个名字。但是不是因为这个名字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其实她在解放以后就改掉了这个名字，不叫这个名字了。再有，表示自己积极进步吧，表示自己要积极进步吧，她就用几万块钱的存款，要交党费。意思就是说，希望江青说句话，文艺界的嘛，说句话，能不能免除这个冲击？这样的意思。我有个错误，就是我误会了，我（误）以为她和江青有什么关系。

（误）认为（她）和江青有点关系。我就说这信怎么处理？如果简单的话我就处理，转到有关部门去处理，不就完了嘛。就没事了。我就觉得这个信件不好处理，我就怎么办呢。我就给江青写了条子。说江青同志，并不是（信里的那个），给她写的信当然是她了。就说内容当中有你的名字。你说这事怎么处理？问她这个，写了条子。江青拿到这封信第二天就找我谈话。当时戚本禹还没倒，戚本禹比我晚三天。我是1月9号隔离的，戚本禹是1月12号抓到。晚三天。第二天就把戚本禹、姚文元叫了去，把我也叫去。叫到会议室，江青把那封信往桌子上一甩。“为什么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我当时吓蒙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看到这封信，我说：“这封信是不是和你有什么关系啊。”“你无知，无知就要犯错误，就要犯罪。你把郭沫若的《洪波曲》借来看看。”（徐：郭沫若有本《洪波曲》写香港的。很出名的。）《洪波曲》讲了，我确实借来了看了。看当时讲了什么呢。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啊，上海的文艺界人士啊，有一部分去了武汉，去了重庆，有一部分去了延安。江青是去延安的这么一个人。其实当时并没有江青的名字。她就让看这个。当时她女儿也正要看看。这封信就是导火线。导火线就这个。我当时定了什么罪，我也不知道。我是后来1975年（知道的）。我是68年1月关起来的，我在那隔离审查在连部住了半个月吧，就关到秦城监狱去了。一关关七年半。七年半也没问过这个事。我们1975年出来，1975年不是放了一批人嘛。放出来以后，我们放的时候是这样说的。说中央，毛主席、党中央宣布释放你，到湖南某农场到那去，等待结论。当时整整七年半了没结论。当时我就问他，我到那里人家问我是干什么的，你是怎么来的（我怎么回答）。（他说）不能说是江青秘书。那我说我是什么？我说我是《红旗》杂志的可以吗？那可以，可以说是《红旗》杂志的，但不能说是江青秘书。到1975年5月释放的，就到湖南农场去了。所以我到十月份就宣布结论，结论两条：一条是妄图用假材料陷害中央负责同志。（徐：假材料陷害中央负责同志。）这封信跟江青没什么关系。这个人也不认识。如果是演员的话，40年代去了，江青是30年代，根本不认识江青。因为文艺界的，所以给江青写封信。就那么个意思，就是这个材料不是真的了。妄图用假材料陷害中央领导同志。很重的结论嘛。第二条结论才有意思呢，包庇，不是打516嘛，还没说我是516。包庇516份子吴传启、林聿时。吴传启、林聿时都是十一、二级的干部。不是十一级就是十二级。林聿时可能十级，十一级。你看我这事，我有什么资格包庇他们？明明是编造的。那妄图陷害领导人，就因为那封信。当时让我签字。（我）说，我送这封信影响江青工作和身体，给我什么处分都可以，但是说我陷害江青，陷害中央同志，我绝对没这个心。

~~~~~

【往事非烟】

## 清华文革风浪四年（下）

• 阎 淮 •

（编注：本文节选自《进出中组部》一书第三章的五、六两节）

### 第三章：老红卫兵头头的反思——清华文革风浪四年（1966～1970年）

#### 第五节 工宣队的统治与我的反抗

##### 3-16、与工宣队的摩擦

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遣61个工厂3万工人，在8341部队（中央警卫团）配合下，突然开进清华园。工人被不明真相的蒯大富派攻击，死5人伤731人。8月，工人宣传队宣布长期进驻清华，要求师生立即返校。9月我们从河北农村回清华，经历了一年半暗无天日的被管制生涯。

毛泽东亲自培养的典型是“六厂二校”，即六家工厂和清华北大，印刷“毛选”和“毛像”的新华印刷厂是最革命的第一厂。工物系的工宣队就来自该厂，“工军宣队”的系领导是8341领袖卫队的一位连长。在极左“激情燃烧的岁月”，最左的尖刀插入清华最机要的系，是顺理成章之势。我与他们左派的做派格格不入、摩擦不断的原因有三：一、经过两年的学习与实践，已初步形成“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愚昧很强大，能禁锢人一世；又很脆弱，一旦挣脱，任何力量绝不会使你再度愚昧。聪慧整天被蠢笨教诲，无比难受！二、我们反动大字报点名批判的关锋和戚本禹已被毛抛弃，而口头讥嘲江青无纸无字，从不承认，我的反革命帽子不翼而飞。三、工宣队对伤害工人的“团派”恨之，对武斗的“四派”恶之，对我们“逍遥派”好之。摩擦具体事例如下：

“新抗大”事件。8341那位连长异想天开，让实验室工人用有机玻璃做两米见方的“新抗大”三个字，放在系馆楼顶。我说：“剩余的下脚料不要扔，我要做‘活雷锋’三个字别在胸前。”“新抗大”在楼顶立足未稳，被迟群发现，勒令取下。我说：“多亏我的‘活雷锋’还没做，否则和你们一样瞎忙活了！”连长想整我，还没来得及，我们就化敌为友了，因为次日，陈元来找我，连长与陈握手问候，原来他曾是陈云的警卫员。陈元指着我对连长说：“你要早听他的，不会被迟群训了。”农民出身的连长对首长及其子弟有极朴素和极浓厚的阶级感情，因此对我也不计前嫌，格外照顾。“翻身学生得解放，

幸福日子几天长。”很快军人撤出，系里只留下工人师傅。我又“吃二茬苦、受二茬罪”了。

工人把社会上流行的、学生们生疏的对“毛像”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毛选”的仪式强加给我们。对此我是心中有怨，但既不敢怒更不敢言。1968年冬“清理阶级队伍”，派出“可靠学生”外出调查“不可靠教师”的历史。我系干部子弟关某“外调”回来作报告说：“旅馆房间只一面墙有毛像，便自费买三幅贴上，使任何方向都能看到伟大形象。我们坚持天天读，回来已后半夜，旅馆没有桌子，还躺在床上读毛选后才睡觉。”我对这种宗教仪式的不满顿时有了发泄点。讨论中我说：“既然躺着学习，就应该再贴一张主席像在房顶。后半夜已是第二天，你们当日还是没读毛选，还不如我们在学校、在工宣队的直接领导下，真正天天读了。”同学们跟着挑毛病，学习榜样成了批判对象。

学习解放军，我们学生编为一个连。连长是新华厂的青工，高考落榜当了工人，文革造反成了左派，在厂里技术不行还挺“刺儿头”，有了工宣队这差事，领导顺水推舟卸了包袱。新华厂轻松了，工物系倒霉了。你从长沙的中专生掌权后如何整大知识分子，就能推测出中学生怎么整大学生。例如他规定，宿舍不许插门（怕看四旧书籍），听收音机不许用耳机（怕听外国广播）等。饭前在食堂前排队唱红歌，无论数九寒天还是三伏烈日，他认为歌声不嘹亮或音律不整齐就不让吃饭，直到他满意为止。我不由得想到奥斯威辛集中营。我们当面叫他王连一长（弱读），背后称他“王连举”（《红灯记》中的叛徒）。过去我对领导提意见，是人民内部的干群矛盾；现在对工宣队有看法，就是反对主席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可能是敌我矛盾。我私下牢骚：“我没当过亡国奴，不知道一个民族被另一个民族压迫之苦；但我亲身体会到一个阶层被另一个阶层管制之难（四声）。我不是基督徒，没有原罪；考上大学的知识分子在落榜的工人面前，也无原罪！”

1969年春进行“整党”，由党员“讲用学习毛选体会”，群众评议通过，方可恢复组织生活。第一批安排“讲用”的是工宣队和学生都满意的，顺利通过；第二批是工宣队满意而学生不满的“积极分子”，如上述的关某，当然没有我。工宣队按照毛泽东“抓三分之一”的工作方法，在关等“讲用”后召集部分同学开会，布置让这批“积极分子”通过。随后的全体群众大会上，我的哥们提出我比关某好，许多“三分之二”呼应，最后我和“积极分子”们一揽子被通过，我是唯没有“讲用”就恢复组织生活的党员。

我1965年入党，遵照当时中共八大党章规定，需要一年的预备期。现在历时四年，中共九大新党章为了使造反派突击入党后，立马担任党内要职，取消了预备期。我恢复组织生活即为正式党员，原本就不软的腰杆挺得更直更硬。“王连举”开口闭口“你们知识分子要接受我们工人阶级再教育”。在学习毛的“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50字建党方针”最新指示时，我虚心地向不是党员的王连长请教我的困惑：“根据毛主席一分为二的观点，无产阶级由党员的先进分子和党外的落后分子两部分组成。知识分子党员的先进分子如何接受党外落后群众的再教育？”他当然无言以对，只能在毕业分配时惩罚我。

我上述的“阶层管制论”和“落后再教育论”在朋友圈中流传。

北大国政系的李海文多年后还记忆犹新，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发表经过及影响》提到此事。（《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

老人家75岁生日那天突然想起了我们，发出“即使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子女，也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最新指示。工宣队召开全校“可教子女”的千人大会，自然也忘不了我，还想让我典型发言。我说：“家父虽然已被定为走资派，但至今还未死亡、仍然健在，尚不属于死不悔改。而根据二分法，参会者是可教子女，不与会者就是不可教子女吗？”胳膊拧不过大腿，我与会了，但不发言。是日发言者，有我熟悉的肖华之子和刘瑞龙之女。我对人对己的要求是“两个不损害”，即：不损害自己之尊严，不损害他人之利益。因之，我耻于发言者。出社会，方知世事之艰辛，对别人不再苛求“不损自己之尊严”。对人及事，皆取“了解、理解、谅解”的“三LJ”态度，文革后与刘等仍为好友。

### 3-17、“家破人未亡，子散妻未离”

这小标题，是我安慰父母的话，它概括了我们六人家庭在1968年以后的状况。

1967年，我被清华同学抄家时，父亲还平安无事。他能平安地躲过1966年至67年文革初期的冲击波。我认为原因有二：

其一、当时行政10级的父亲是物资部机电局副局长。而11级的正局长徐良图（文革后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资历比父亲浅，被认为是物资部长袁宝华的红人，文革伊始第一个冲击波就随着袁部长一起被打倒。第一副局长的父亲就负责了全局的业务，担负起全国机电产品调配的重任。工作需要，他不能垮台。

其二、父亲还兼任机电局的党委书记，他又是热心肠，在政治和生活上都关心下属。例如，使劲发展青年党员，逢年过节带外地单身大学生来家里一起吃饭。人缘好也使他占了便宜。

1968年，全国生产瘫痪，父亲不重要了。“保阎反徐”年轻人为主体的群众组织失势了。运动更深入了！一个局级干部不打倒，留着干嘛？父亲成了“走资派”，并逐步升级：先是停职反省、然后劳动改造、最后关进“牛棚”停发工资。三个中学生的妹妹弟弟，运动初期积极投入革命热潮，分别属于北京中学生的“老兵”、“四三”和“四四”三个派别。热潮降温，伟大领袖在城里“运动”完了他们之后，又运动他们到广阔的农村去刨食。他们三个小孩或自觉响应号召、或被迫迁出户口，分别到黑龙江、内蒙和山西务农。北京只剩下三个较年长的：父亲在机关被造反派隔离关押；母亲是北京市卫生局干部，集中到昌平县的劳动大学；我在工宣队管制的清华大学；只有周末我和母亲才能回家相聚，并给父亲送点衣物。

物资部成立于1964年，同年物资部大院在甘家口东南角修建完成。它西边隔着三里河路与钓鱼台国宾馆相邻，东面是解放军报社；南面是月坛北街，北面临阜外大街。大院南边是高层的部机关办公大楼，北面是宿舍区。宿舍区层级分明：最西面、与钓鱼台相望的是一排五栋、部长和局长的“一梯两户”的三层小楼，中间的是两排十余栋、处长的四层中楼，东面是三排几十栋、一般干部的“一梯三户”的五层高楼。院内幼儿园和小学、副食店和大食堂、医务室和大浴池、经常演电影的大礼堂，应有尽有，一应俱全。宿舍区与办公楼无隔离墙，平时我们骑车穿行方便，文革时办公区干部的大字报就自然而然地对家属们公开了。

从《阎韞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的大字报中，我才知道父亲被隔离的重要原因。父亲在物资部的档案副本（正本在中央组织部）被公开了：解放初期老家土改爷爷被斗，父亲给河南省委写信申诉，“痛说家史”：爷爷在红军时期曾支援徐海东（开国大将）十万大洋，抗日时支持几个孩子参加中共抗日，应属开明士绅。孰料河南省委党性极强，将此信转回黑龙江省委。又哪知黑龙江省委书记对省委工业部长的父亲不好处置，干脆把信放入父亲档案了事，于是乎便埋下隐患。长春第一汽车厂厂长饶斌（原黑龙江副省长）劝父亲去任副厂长，把任命材料报到中央分管工业交通战线的薄一波副总理处。薄调来父亲档案，发现那关键要命的书信；提笔批下八个大字：“严格控制、不得重用”。从此父亲自己也莫名其妙地在仕途上开始走下坡路。饶斌只得改任父亲为安装公司经理，推说安装工作更重要，需要他独当一面云云。1956年父亲调到北京，一机部说东北的高岗（当时已自杀）为笼络干部，级别定得太高，父亲应由九级降为十级，任副局长（后听说大部分东北进京的司局长都降一级）。父亲不计较得失，仍勤勤恳恳工作。此后他到计委机械局给十级的马仪（后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当副手，现在又作了11级的副职。父亲和我如今才明白十几年前的一段公案。

父亲平时教导我“兴无灭资”学习雷锋，作好革命接班人。什么“走资派”？哪个“孝子贤孙”？我才不信这一套！我才不划清界线呢！每周日学校放假，我去机关，在看守监视下，给父亲送去经过检查的换洗衣服和香烟、饼干（父亲肠胃不好）。他平时只抽较高级的“大前门”，现在造反派只许送最差的，我用母亲没有被扣的工资买最贵的“大中华”香烟，放在最差的烟盒中蒙混过关。父亲与我相约，在本楼层最近的厕所、左边第二个蹲坑的纸篓里，我们交换纸条“情报”。如此这般，近一年从未败露。

1969年春节，最难忘、最痛苦的春节！弟妹们刚下乡几个月，不批准回京探亲。除夕傍晚，母亲亲手做了父亲爱吃的丰盛菜肴，一分为二，一半用毛巾被包裹严实。我顶着刺骨寒风，送到机关大楼，在关押父亲楼层的楼梯上，我竟被拦下。看守说：“你爸爸最近态度不好、不老实交代问题，项目组决定不许家属再送食物。”我故意大喊大叫，让父亲听见，知道我来看过他，妈妈在想念他。气愤的我只好到大院中的清华同学家，把菜肴送给她。我不能拿回去，让妈妈更伤心。流着眼泪我无力蹒跚缓慢地向家走去，进门前我擦干泪水，进门后强装笑颜。我对母亲说：“爸爸尝了饭菜很高兴，他身体也不错，还让妈妈多保重！”我们娘俩吃了丰盛菜肴的另一半，我毫无胃口，但强迫自己尽量多吃。饭后我说有点累，就回到自己房间，蒙头低声痛哭。

1969年春天，中共九大前，不知谁发了个什么鸟指示，物资部的“走资派”全部要被押解到河南干校。行前倒是让父亲回家收拾行装，我和母亲都划不清界线，以我俩对方有病为由请假回家，与父亲团聚几天，然后就是生离死别各奔东西。

这一年北京就只有我和母亲，孤儿寡母两个亲人相依为命。一个24岁的不学习的学生，先后到北京特殊钢厂和北京重型电机厂干重体力劳动，美其名曰“按领袖指示：学工”。同学发牢骚：“现在是猛吃、猛睡、猛干，三猛！”工宣队说首先应该是学习毛泽东思想，让我们批判“三猛”。我说：“三猛非常错误，根本不可能！猛吃没粮票（学生定量30斤）、没钞票（20多岁了白干活还没工资），猛睡没时间，猛干没力气（吃不饱、睡不好）。”工宣队哭笑不得。

母亲，一个患冠心病的老干部，集中在远郊区，住集体宿舍。每周末挤公交车回家，随身带着纸条，上写：“我是某某，患心脏病、若休克，请通知在清华工物系的孩子阎淮。”我们两个“住校生”都盼望每星期六下午回家母子团聚的一天，也期盼回家能看到天南海北在乡下务农的其他四位亲人的来信。我经常安慰母亲：“文革中多少个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们家是：子散妻未离、家破人未亡。知足吧！”星期天晚上，是可恶工宣队规定我们回校的时间。我从家里迎着昏暗的月亮、顶着呼啸的北风，骑车北上清华的20里路，是我心理情绪的变压器；在这30分钟里，我要深埋温柔脆弱的亲情，穿上精神的盔甲、带上坚强的面具，面对以知识分子为敌的工宣队，迎接新一周生理和心理上新的磨难。

### 3—18、毕业离校远赴西北

1969年9月3日，广播传出《烈士魂》哀乐，越南领袖胡志明逝世。陈元、宋克荒、刘泽彭和我讨论形势，一致认为：中国的《烈士魂》播出前，文革混乱的局面不会结束，我们应养精蓄锐充实自我，静待天子归西，届时再展身手。他们也劝戒我锋芒“避”露，少惹是非。

回顾工宣队在清华的历史，工宣队的最大功能就是管制和整治知识分子。使我们从整体意义上成为“再教育”、“给出路”、“可改造”的革命对象。一工宣队头目说：“什么时候知识分子的心情舒畅了，就说明我们的工作有了问题。”赤裸裸地道出了工宣队以知识分

子为敌的心态。（唐少杰：《一叶知秋》，285页，中文大学出版社，香港，2003年。）不是我喜欢招惹是非，只是我不情愿被别人“心情舒畅”地管制和整治而已！

1970年初，在工厂无偿劳动十个月后，突然被召回学校毕业分配。原因是清华和北大准备招收工农兵学员，要为他们腾出校舍。工宣队实行毛泽东的法家路线：论功行赏、有仇必报、奖惩分明。具体方案是：“连级干部云集大连，落后学生发配新（疆）西（藏）兰（州）。”我则连兰州都不如，是火车过兰州再开一天的甘肃武威县，古称“凉州”，其荒凉可想而知。“布尔什维克”们也都没好果子吃：陈元分在湖南新邵县，刘泽彭分在吉林梨树县；宋克荒听造反派赞美林彪江青，气不顺说了不恭之话，被定为反动学生留校审查。我们离校后书信不断、互通情况。1971年春节，北京探亲再聚会，四人交流了通信不便谈的思想。最重要的是陈元通报了九届二中全会的内幕，特别是毛在庐山会议结束时说的“事情没有完”。我们分析了毛泽东与林彪的性格特质和处事方略，都预感还有大事将发生。1971年9月下旬，我在甘肃接到宋克荒北京来信，告知“老虎和爹娘摔死在内蒙外”，在正式传达前得知“九一三事件”。1972年春节，我们四人在北京重点研习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认为公布它是毛乱方寸，有利于民众的觉醒和文革的破产。这是我们70年代初的交往，友谊持续着，政治上的再次交往是80年代初，而80年代末的一场“风波”使我与他们在政治上分道扬镳，只保留着私人情谊。

1970年3月，登上西行列车，经过两天两夜只坐不卧的艰苦旅程，奔赴遥远的西北陌生小城。24岁的我，确实想到57年前，一个同样24岁的青年，在同样的春天，同样背井离乡远赴西北。我们同样“一事无成、一文不名、一无所有，但是拥有不可抑止的自信心和深刻炽热的使命感”。（引自《第三帝国的兴亡》）他就是我深恶痛绝的阿道夫。第二感觉有点革命性了：我像冲出牢笼、将在广阔天地自由翱翔的海燕，“在乌云和大海之间，高傲地飞翔，充满着对暴风雨的渴望、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焰和胜利的信心。”（俄国高尔基《海燕》）

此后五年，通过艰苦卓绝的“我的奋斗”，在工人、技术员、车间主任、厂长的路线图上，爬到县团级的武威煤矿机械厂的顶层。在全面整顿和回潮的1975，对口调到北京煤矿机械厂。对着清华园大喊：“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清华文革的四年，我犯过严重错误，也有丰硕收获。文革前，我是一个狂热的极左毛粉；文革初，看到基层的诸多问题，以为是歪嘴和尚把马列毛的正经念歪；中期，对高层残酷和底层贫困的了解，知道大和尚嘴也歪了；后期，认为马列当年可能是真经，斯大林和毛泽东“跑偏了”，好经也要与时俱进。我们的使命就是拨歪返真、修正旧经，净化党的领导、完善社会主义，作补天救党派。

文革中，通过深入城乡社会底层和研读先贤哲人经典，树立了平民意识，我成为干部子弟中的异类。维克多·雨果的“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成为我的绝对价值观。1986年，中组部的我，到许多省委组织部和党校抨击时弊鼓吹政改。有人指责：“你天天吃党的，日日骂共产党！”我笑答：“你们天天夸党，是日日害党，我是在救党！”1989年，“动乱一暴乱一风波”后，人道主义的我不同意镇“暴”，出走了。9月20日我在《欧洲日报》上写出我的理想社会是：民主政治、自由经济、独立司法、保障人权。——好像与某党现在的要求雷同，是吗？

□ 节选自阎淮：《进出中组部——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明镜出版社，2017年

~~~~~

## 【亡灵祭坛】

赵老师

• 韩 莹 •

赵老师在清华附中教体育多年。1964年我入学时，他已是白发满头的老教师了。赵老师喊起操来嗓门特亮。每年一度的校运会上，他都担任裁判长。他公布比赛成绩和名次时的宏亮声音，不用麦克风都能传遍操场。所以，附中的学生大多认识这个慈眉善目，整天乐呵呵的胖老头。

赵老师没有正式教过我，只是每天下午在短跑队带我们训练。几圈绑砂袋的负重跑下来，我的腿肚子抽筋了。赵老师蹲下身为我按摩小腿。他又高又胖，肚子又大，蹲在地上肯定很费劲。为我揉捏小腿时，呼嗤呼嗤直喘粗气。望着他头顶稀稀疏疏的白发和鬓间星星点点的汗珠，我心里真想喊他一声“爷爷”。

“文革”开始没多久，赵老师就被关进学习班。听说罪名是他年轻时曾在中缅边界为国民党运过军火。记得是一九六六年八、九月份的一个下午，我一手托着准备和李承穗包馄饨的面皮一手扶把，逍逍遥遥地从清华大学骑回附中。校园里空寂无人，人们都在五楼大教室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演出。我循着手风琴声向楼上望去，却见从四楼关押“黑帮”的教室窗户里探出一个人来。那人费劲地攀着窗框，爬上窗台，慢慢在窗台外沿上站直了身子。他朝下看了看，在我俩目光相接的一瞬间，好象意识到什么，我惊喊了一声：“赵老师！”话刚出唇，赵老师已经一个入水式纵下高楼。沉闷的一声响后，赵老师就跌落在离我几米远的草坪上。

我吓得连车带人摔倒了。待爬起来，只见赵老师俯卧在地上，摔破的头侧向着我。白发间，鲜红鲜红的血混合着白色的脑浆流出来，很快汪了一滩。他眼睛半睁着，脸上有青紫的伤痕，手里捍着一团写满字的纸……。

2000年，我去东南亚旅游，在泰国与老挝交界处凭吊著名的二战遗迹——桂河大桥。从史料中得知：抗日战争时期的中缅公路是中国战区唯一的后方补给线。在这条日本鬼子炸不烂，掐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上，无数的抗日战士、热血男儿，为民族，为国家，为正义，血染疆土，慷慨捐躯。

南国炽热的阳光中，六十年前的战火硝烟早已飘散。置身中缅公路旁，只见青山寂寂，绿水悠悠。我又想起赵老师。抗日战争时期的赵老师也就二十岁出头吧，正是和殴打作践他的红卫兵们一样的年纪。我不知道，抗战时期，年轻的赵老师在中缅公路上驾驶的汽车，运的是弹药还是药品；不知道他曾怎样躲避日机的轰炸，遇到过哪些危险；不知道在学习班时，他有怎样的遭遇；谁在他脸上制造了伤痕；我不知道，他用标准的入水式纵身坠楼前，内心有过怎样的挣扎与苦痛；也不知道，若干年后，组织是否为他平反，给他一个公正的结论；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是写为赵小冬，还是赵晓东或赵肖东，但我永远忘不了他坠下高楼的身影和坠楼前看我的那一眼。

这几十年里，我多次设法寻找过他的家人，想告诉他们老人生命最后的情景，可我没找到。

我依然在寻找。

浸透鲜血的记忆永远不会淡逝。为让四十几年前发生的事情不会变得象五千年那样遥远，我写了这些文字，希望他的后人，他的学生和曾在他脸上、身上、心上制造伤痕的人们能看到这篇文章，并因此想些什么。

我以这篇《赵老师》为花圈，奉献在曾想喊他一声爷爷的老教师灵前，以为永久的纪念。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